本文仅摘抄了韩丁关于农业部分的论述，详细部分可参看原文。但韩丁对于8964事件的看法和理解是我不太赞成的，因为过于复杂以及敏感所以掠过不讲，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场动乱中没有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人是正义的。很多毛派都拿这件事来当作稻派的污点，表示对学生的同情以及对修正主义的愤怒，但是这是不合理的。学生也是盲动被利用的，绝不能因为他们是学生而单方面认为他们就是完全正确的。

对合作化农业的改革始于 1980 年，中共中央低调的指示，推荐开始在小范围推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在这一制度下，每个农户家庭与队或村签订合同，规定应当上交国家和生产队的部分，剩下的产出归农户。在一些偏远地区，人口居住极其分散，集团开会、生产和公共财务几乎没有意义，这个家庭合同制或者“责任制”被认为是不可取代的。我根本没有想，这个显然是从集体化农业后退 的政策，会被邓用于清算整个集体化农业系统。经过一段时间，这项政策的最终目的日益明朗：全 面的私有化，丝毫不考虑社会的意愿以及当地的具体情况和环境。

而在山西东南角的张庄，虽然五年中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张庄的农业 机械化项目最终也化为乌有。1978 年，张庄人就开始自己搭建组装的农业机械，在 200 英亩的玉米地 上，可以自动完成从施肥、平土、播种、除草、收割、烘干到将烘干后的玉米存入仓库的全部过程。机械组只需要 12 个人，但劳动效率是手工时的 15 倍，而且花费仅仅为原来的一半。但改革后，土地 被划分为无数的小块分给了单个农户，机械化农业也不得不让位于原始的间断的个人耕作了。农民们 没有选择，只有抛弃他们先进的农机，重新扛起了锄头。而银行向村里索要贷款时，村里的头头们说：把机器拿走吧！ 银行自然是不可能找到买主的，所以直到今天，这些施肥机、平土机、喷雾器、喷灌 系统、玉米收割机、干燥机都躺在院子里慢慢的锈烂，默默的述说着那个过去的年代，那个被刻意回 避的年代。

也就在那个时候，一次不同的经历使我认清了中共中央推行的所谓改革走得有多远。1983 年的夏 天，我乘飞机从北京飞到上海。在 3 万英尺的高空，我向下俯瞰，我第一次看到了“责任制”给广阔 6的华北平原带来的令人吃惊的变化。

我向下看着，越来越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眼泪也禁不住流了下来。从前，在村落和连接它们的道 路间，有着整齐的方形的长方形的土地，绿色的、黄色的、褐色的，一直延伸到地平线。而现在，细 碎的一小块一小块的土地排成零散杂乱的图形，蔓延上千公里。这不是土改前的所谓的“邮票一样小 块”的土地，是比那更细小的带子一样的，面条一样的土地！ 那些土地是那样狭窄，以至于马车经过 时，一个轮子在这个人的土里，另一个轮子就压倒了另一个人的土里。

中国的农民一度曾有了这样的生产规模和农业制度，使他们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导向的机械化武装 的城市居民兄弟们一起，多少能算同步的进入现代社会。可到头来却成了这样！ 就像荧光屏上闪过的 一个小小的亮点，曾经有过的规模化生产，曾经有过的制度，就这样消失了。历史的书卷中，这新的 一页刚刚翻开，却又马上后退了千百页，又一下子回到了起点。

一个目瞪口呆的农民同志对我说，“我算看明白了，通过农村改革，共产党把农村这块包袱丢掉 了。从现在起，他娘的，你要是落后了就只能怪你自己。“

我也清醒地认识到，许多的农民拥护改革，合作化时期也有不少的村庄陷于萧条状态。现在，个 人有了土地生产的决定权而且可以随心所欲的决定自己从事的副业，加之同时期农业品价格的上涨，这都使不少单个农户了可观的收入。

然而，在我看来，单毫无理性的将土地分为细碎的小块这一项，就足以抵消政府所能看到的、或 是精心修饰使其看起来比美妙的所有的优点。在我看来看，面条一样小块的土地只能是死路一条。我 无法想象，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只拥有小块土地小农可以有什长远的的希望，而且他们当然不是 中国现在这样的只有有四处分散的一两亩土地的小农。农民用锄头耕作，这种低效的生产方式意味着 一年到头最多就能收获一吨粮食，只是我在宾夕法尼亚用拖拉机机械化耕作产量的八百分之一。一吨 的粮食，只值一百多美元，就将要决定无数这样的耕作者未来的生活水平。随着工农差别，城乡差别 和脑体差别的增大，和自由市场带来的无情的剪刀差，小农们无论现在享受着怎样的繁荣，都注定只 是昙花一现。

不过，“责任制”初步显现出来的一些结果，似乎证明了我的担忧是杞人忧天。许多“面条一样 小块土地”的承包人，收入上升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在这收入上升的背后，不仅有农产品价格大幅度 上升的因素，而且还有国家对超定额纳粮者的奖励。由于化肥，农药供应充足，灌溉用管道增加，获 得国家的超定额奖励成为一件容易的事，这样以前住在闭塞的村庄里的农民们也找到了同往市场之 路。与此同时，许多不愿或不能得到土地承包合同的人，外出自谋出路。他们中只有一小半能找到工 作，但能够找到工作的那些人——通常是手工艺者，小贩，车夫，建筑工，短工等等，大多收入增加 了。就这样，随着改革势头的增长，农村里不少人的生活改善了。与我的预期相反，农产品的产量普 遍与以往持平甚至有所上升，至少从图表上看是这样（官方的统计从来不会犹豫尽量的利用产量数据，尽管冷静地看那些数据仅仅是产量预测而已）。而且经济作物，如棉花，油菜籽，烟草和其他特产，因政策性大幅涨价产量增长尤其迅猛。考虑涨价和非农收入带来的收入增加，农村经济出现的“生机 勃勃”的增长有了根据。

1984 年，政府宣布并庆贺粮食产量有了历史性的增长——粮食总产达 4 万吨。因为大量商品粮出 现，在自由市场上粮食的价格降到接近国家供应粮的结构。改革带来的丰收给了多少人幸福和快乐啊。有关部门认为粮食问题得到了彻底的解决，贸易商们甚至开始商谈饲料粮食大量出口的合同了。改革 看起来确实有效，至少在如此美妙的丰收面前。如果有什么严肃的问题的话，那就是这个私有化的“新 社会”通向何方？改革之路是否通往社会主义？

到处都是改革带来的繁荣昌盛（而实际上发展是很不平衡的），看起来没有多少人会关心最终的 结果。不过，因为共产党多年来一直承诺搞社会主义而且也很重视毛主席提出的：只有社会主义能够 救中国，“改革家”们以承诺坚持社会主义来获得“顽固派”（难道他们不是“动摇派”吗？） 的支持 ——而同时“辩证”的发展并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含义。（译者注：若干年后一度洛阳纸贵的《交 锋》一书的作者这样评论到：“联系后来改革的历程，人们发现，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主义的 包容也在不断扩大，这是解决中国人思想困惑的极为有效的措施。”真是一语道破天机！不仅包产到 户、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而且私营经济、雇工剥削也是社会主义，中国人多么幸运呀！ 他们一下子 就建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 理论家们都奉旨投身到这项任务当中了。那个时候他们还没 有发明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什么都能往里装的大筐——这样美妙的词儿，他们把社会主 义定义降低为，1） 公有制，因为土地仍然是国有的； 2） 按劳分配，因为签署承包合同之后农户们都 是自负盈亏。

当任何人都不能否认，存在大量农户（鱼塘的款爷，果园的财主，养鸡场的大亨——诸如此类媒 体的新宠） 雇用邻居并将大量的利润装入腰包时，理论家们开始宣扬管理也是劳动（从来没有人否认 这一点），却并不澄清资本带来的收入和劳动所得的差别。这两者于是都统统归结为管理的努力应得 的合法回报。剩余价值消失了，剥削也随之不见了。“怎么会有剥削呢？”他们问道，“被雇的人比干 自己的农活挣的钱要多啊！”

这套“公平合理的一天的工作应当得到公平合理的一天的收入”的逻辑打消了对剥削的顾虑，至 少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是如此。中共中央认定，只要工人数目没有超过八人，雇工是没问题的，甚至 是再好不过的。雇工在 8 人以内的都是“个体经济”。在这些企业里工作的人被认为是雇主的家人（从 实际情形来看也确实有不少人是雇主的亲戚）。这样一来，如果存在剩余价值的话，也仍保留在家族 内部。但很快这个解释就行不通了，在新生的富有的企业主里，不少人建起了工厂，并拥有成百上千 的雇员。这些企业主无论言行举止还是挣钱花钱的方式都与资本家一样。再不能认为他们雇佣的都是 亲戚，再也不能认为工作条件和支付的工资是公平的。现有理论不能驱除剥削的罪恶，于是新的折衷 方案，“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运而生，为剥削的现实提供了合理的生存空间。这套新的辩护 说词大概是这样说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需要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因此只要能实际上刺激生产力发展，就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被定义为等价于社会主义的进步。邓总是强调“抓老鼠”，也就是说 通过一切的方式方法来生产产品提供服务，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错的旧时代的做法，私人为了获取利润 而投资等等——就像我的老同事，纽约奶牛场联盟主席 Archie Wright 曾说过的“一块钱该怎么挣的，就怎么去挣”。有了这套推理，中共中央创建了叫做“私营企业”的新的企业类别，一个没有任何限 制的类别。

这套实用主义的做法在社会上推行之后，很快产生了各种的反常现象，矛盾冲突，并加速了社会 的两极分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在这个阶级斗争被宣布为已经不复存在的国家。社会的两极分 化，也就是阶级分化，主要是大量的小农变为廉价的雇工（在集体化时代他们是公社的股东），同时 也极少数人成为了资产阶级。农村改革后，大量小农从小资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这可能是世界历史 上最大规模的一次阶级转换。这一切的发生并不是因为农业生产机械化带来的剩余农村劳动力造成 的。在成为工人阶级的这部分人中，有的是因为不想签承包合同，大部分则是因为年龄，健康，性别，缺少劳力或是耕作工具等等

除了两极分化，改革带来的最惊人的后果是社会风气的败坏。私有化，使得农村经济退回到与解 放前相似的境地（很多将土地承包合同转包出去的人，所作所为就跟过去的地主一样），同时也带回 了旧社会所有的陋习：迷信、赌博、吸毒，以及操控这一切并从中牟利的新生的黑社会。从文化环境 来看，带着浓厚的封建意味的旧风俗、旧习惯、旧意识形态还有旧的迷信统统卷土重来。没有集体的 力量来对抗大自然，农户们自觉的退回到旧文化的支持者，诸如重新开始拜土地、祭灶神等等。张庄 最新的建筑就是一座土地庙。他们又热衷于嘈杂的传统的庆典，付更多的彩礼，办更浪费的婚礼和奢 侈的葬礼，建更铺张的坟墓，为了应付这些高昂的开支他们又开始借利息惊人的高利贷。理性和科学 的承诺退却了，革命努力提倡的节俭、朴素失败了。

党组织内部的堕落同社会风气的倒退一样严重。一旦党叫农民开始自己致富，党员怎么能不带头 呢？否则，就没有人相信党是支持“先富”那部分人的。为了追名逐利的蝇营狗苟破坏着共产党员应 守的准则。领导的滥用特权，一直是集体化系统下的严重问题。现在更和金钱联姻，为了追逐财富，腐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大肆扩散。渎职、回扣、投机，使得党还仅存的一点威望降到了低谷。更令 人担忧的是，国家已不能指望大大小小的干部们在同外国公司、跨国公司做交易时把国家的利益放在 第一位。在这个层次上，社会风气败坏已威胁到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抛头颅洒热血辛辛苦苦换来的国 家主权。

最后，改革也引发了对环境的空前的破坏狂潮。因为每个家庭从此必须自负盈亏，经济活动的目 标从追求长远利益一下变为追求家庭利益的收入最大化。这一变化使得数以亿记的人们开始寻求可以 带来快速的收入或是直接的收益的一切事物。这引发了对已受破坏的脆弱的环境的一次大进攻，遭受 劫难的不仅有山地、树林、水资源、草原、渔场、野生动物、矿藏，还有一切可以被砍伐的、被耕作 的、被抽取的、被发掘的、被捕获的、被拿走的……在集体化农业时代，矿藏和林木这样的资源都被 认为是国家财产而保留，不过也允许当地有控制的开采、砍伐（不幸的是也时常遭受滥采滥伐）。国 家对如何使用山坡、草原、大片水资源以及其它容易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做出了规范（虽然不是所有 时候都有效）。而许多公社为了公众的利益，也执行和强化了上述管理。改革后，公社不复存在无法 再限制滥用自然资源；国家不仅放松了对自然资源保护规定，就是仍存在的规定也无法执行。

从 1985 年的秋天开始，改革带来的令人欢欣鼓舞的飞速发展日渐显露出真相。据农业部统计 1985 年粮食产量比上年下降 3 千万吨。从其它有关部门得到的数据是下降了接近 5 千万吨。最后他们达成 共识，粮食产量下降了 2 千 5 百万吨，数据如何得来却已无从考证。因为全年天气并不太糟，减产没 有合理的原因。一些权威人士将其归结为价格波动，84 年的大丰收使得国有粮仓囤满了粮食从而导致 国家承诺的粮价下降。现在可以看到，问题并非来自于 85 年的粮食产量，倒是 84 年的粮食产量有问题。84 年的收成并 没有打破记录，仅仅是个普通的年成。增产的粮食中，其实大部分来自集体的粮仓。合作社解散分产 后，农民们将分得的粮食卖到了市场上。而且，因为害怕家庭责任制带来粮食减产，国家同时也从国 外进口了数百万吨的粮食，这样造成了市场上粮食的“涌流”和粮价的下降。“那个冬天我们吃的都 是加拿大的小麦。”一位北京居民告诉我。

实际上 1984 年的粮食总产量并没有 40500 万吨，因此他们此后也无法再重复这一创纪录的“大 丰收”。改革家们脍炙人口的胜利不过是个幻影。持续粮食短缺的忧虑使得人们冷静下来。回顾历史，1985 年也是其它领域的转折点，正是这一年，价格双轨制使得高层的投机者的职务腐败，不论从量上 还是质上都达到了新的高峰。同时，中央向地方分权政策，使得省、直辖市在贸易领域成为实际上的 独立王国。一方面他们设置对自己有利的省际贸易壁垒，比如囤积紧俏物资和资源； 另一方面，他们 向国外大肆购进昂贵的豪华轿车等大件消费品。这样，他们很快花光了国家的大量外汇储备。中国当 年与日本贸易中入超达 150 亿美元，大量进口也挤跨了很多的苦苦挣扎的国内工业。在此期间资本投资激增，但大部分没有进入生产部门而是进入了非生产性部门，如城市高层住 宅，办公楼、娱乐设施和几乎空置的豪华旅馆。政府的所有部门都争先恐后的挤入有巨大利润前景的 涉外旅游业，但鲜有成功。与此同时，没有任何单位能够启动改善农业基础设施的工程，因为合作制 度被取消后无法无偿动员农民，而没有任何单位有钱投入。没有生产作为补偿的消费带来了通货膨胀，尤其是食品价格的上涨冲击了城市居民。他们已经将 收入的一半用于食物。但通货膨胀同样也使工业品价格上升，尤其是燃料、化肥、杀虫剂和农用机械，这使得农民减少购买从而也对农产品产量造成了负面的影响。

改革给经济带来的刺激日渐消退，1985 年改革家们开始遭到报应了。直接的和承包制的私有化，以及经济从政府导向开始转为市场导向的所带来的矛盾不断尖锐。当年 10 月，主要城市的街道上出 现了学生游行，抗议日货泛滥，物价上涨，腐败盛行。从此，中国内部的混乱持续上升。虽然重新主张中央加强控制一定程度减少了贸易的不平衡，但 非生产性的资本支出仍在控制之外。通货膨胀率达到新高，1988 年末一度出现了挤兑的狂潮。其它问 题也每况愈下，诸如不断增高犯罪率、出生率、人口增长率、传染病发病率，环境的急剧恶化，还有 粮食的减产等等。1988 年，粮食据报道减产 9 百万吨而实际上可能被低估了，政府此归结为受天气的 影响。一些城市居民不得不在粮食配给份额接受部分粗粮。农民杀光了鸡、猪乃至奶牛，因为没有足 够的粗粮作为饲料。

关于这条发展道路的问题以不再是：这条道路将通往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条道路的资本主 义特征是明确无疑的。新的问题是：这条道路是前进还是后退？

回顾迄今为止的十年，我们确实可以发现一些在十年前不太明显的特色。其中之一属于改革家们 惯用的手段。在改革的整个进程中，他们采取的手段都是这样的——先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或者上层 建筑领域中多少不太起眼的问题入手进行“试验”，从而避免引起太多的争议，然后以试验卓有成效 为名大规模的进行推广，而且也不再限于试验的原有目标。在推行这套渐进的、曲线式改革的过程中，改革家们总是避免与可能反对他们政策的强大的社会力量正面冲突。而当任何可能的反对者明白过来 实际上所发生的一切时，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既成事实：改革家们攻击的法律或实践已被基本改 变。邓首先用这套渐进的办法实现了农业的私有化，然后又用同样的手法解决了私人雇工剥削的合法 化问题。禁止一切私人雇工的政策被修改为允许“个体”企业雇用 8 名以下的工人，后来又放松为批 准私营企业雇用成百上千的工人。仅仅一两年的时间，就从禁止剥削转变到全面允许剥削。最高领导 们为私营企业正名，称其为新近发明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必要经济成分。到 1988 年底达到的 目标是，私人所有已占全部工业企业的 30%，而职业经理人也通过承包逐渐占据着残留的国有部门。与此同时，国家计划在工业领域将其所持有的国有资产以股票的形式出让给工厂职工、个人经营的国 有单位以及私营企业。改革家们娴熟地重复着这套手法，直到大家都明白，改革根本就不是什么解放思想，探索一条“通 往社会主义的中国式的道路”。改革的领路人们并没有“摸着石头过河”——就像邓声称的那样—— 他们处心积虑，蒙着面罩对整个社会主义制度发起进攻，而代之以一整套与私营经济和自由市场相适 应的所有制，生产关系，法律，习惯，文化。

省会合肥往北行途中，第一件打击我的事情是安徽北部农村的极大退步。我们似乎在时间上滑 到了中世纪——被废弃的灌溉工程，留下了成群满是碎片的土坯房屋，在没有框架的窗户和门上面是 黑色的茅草房顶。泥土围砌的院子刚刚高于街道的污水坑。一些猪背部凹陷，它们倾斜着身子，满是 蠕虫，在喧闹的脏乱的孩子中间漫无目的的游荡。仅仅是这些孩子们身上的衣服，掩饰了对可怜贫穷 的普遍印象。男孩子和女孩子们到处跑着，它们不是穿着解放前的破布衣服，而是穿着制作得很不错 的夹克和裤子，它们是由带有印花的机器织的布做的。尽管街上的孩子很多，但闲逛的无所事事的大 人们更多，他们看样子除了时间之外一无所有——悠闲的时间是世界上每个落后乡村的祸根。

副县长王长泰说，这是因为任何个人付出的努力和他所获得的回报之间的联系是非常少的。农民 根本看不到通过努力能给他们个人带来任何进步。他们的目标就是干尽可能少的活，依赖政府把每个 人带到第二年的春天。当坏天气破坏了他们的努力时，即使政府也不能弥补这个空缺。于是成千上万 的人出去乞讨。王说，在过去 10 年中有 9 年受到自然灾害的侵袭，无论是干旱还是洪涝。每年冬天 平均 5 万人离家乞讨。在最糟糕的年份，15 万人出去乞讨。出去的人并不总会来。在回来的男人中，许多人再也找不到老婆了。人口增长缓慢。在某些地方，人口甚至减少——这个现象为新政策的成功 搭好了舞台。当到了分配土地的时候，每个人得到了至少 2 亩土地，有的人得到了多达 5 亩（几乎有 1 英亩）土地。这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 至 5 倍，并为家庭式的生产提供了相对牢靠的基础。

我发现自己很难理解，为什么合作社在安徽如此沉重的失败，而在我近年来参观过的其他地方却 是如此的成功。1980 年由一群年轻的经济学家——其中包括新任命的中国共产党凤阳委员会第二书记 翁永锡——所做的全国调查表明，在中国有 30%的合作社发展得很好，30%做得很差，另外的 40%位 于中间水平，既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也没有得到惨重的失败。我所见到的大部分成功的合作社都在 北方，尽管不是全部，它们位于或者接近老解放区，那里的农民最初支持共产党是因为它领导了抗日 战争或者反对国民党的解放战争。长年的武装斗争培养了懂政治的农民干部队伍，他们后来领导了土 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而且都领导的非常好，至少在许多地方都如此。在另一方面，安徽省没有经过 这样的历史。1949 年被北方的部队解放，1952 年在外面人员的领导下进行了土地改革，然后没有经 过任何互助组的实验阶段，就直接进入了土地合作运动，这在短短几个月就实现了从初级阶段到高级 阶段的跳跃。在初级阶段，当分配收入的时候，所占有土地的份额会算在内，但在高级阶段，仅仅是 劳动力会算在内。在后一阶段甚至都没有在表面上取得巩固之前，公社运动就把平均主义发展到了空 前极端的程度。因此合作耕种（在这里）从来没有获得过威信。

根据王永锡的说法，安徽的合作化运动违反了农村组织的两个基本的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农民必 须是基于本地模范在经济上的成功，而自愿地参与； 第二个原则是收入必须基于所付出的劳动进行分 配（按劳分配）。党的领导人忽视了这些基本原则，在他们能够看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合作 化的高级阶段） 能够取得的优点之前，就匆忙的催促农民进入到合作化的高级阶段，并且建立了收入 分配的形式，这种分配形式把收入或多或少的根据人口进行平均分配，而没有考虑到个人所花费的劳 动。没有经验的地方领导人，在新的按人分配的体制下，不能够激发任何生产的热情，只能利用自己 的权力筑起了自己的安乐窝（即只为自己谋福利）。这样周期性的，揭露、挑战并取代他们的人，当 面对同样的惯性时，也最终使用了同样的价值观，开始为他们自己服务而不是为公社服务。解放 30 年后，当安徽的农民不能让人均产量比他们开始（实行合作化） 时有任何提高的时候，像目前党的第 一书记王宇新，它的副手宋林生，和副县长王长泰之类的人决定，是到了痛苦的重新评价（合作化） 和倒转前进道路的时候了。

在凤阳县我们所到过的所有地方，人们谈论最多和期望最多的是一种作物：水稻。水稻种植的最 新事物是杂交种子，它具有远超过 100 蒲式耳每英亩的产出潜力。一些大队已经开始专攻杂交水稻种 子，他们每斤售价 2.5 元。水稻需要水，至少一半的水来自 50 年代集体运动建造的大规模灌溉设施。剩余的来自小湖泊，池塘，和当地许多年来修建的集水池。一共加起来，他们存储的水能够灌溉该县 大约三分之一的耕地。和南面各县如此明显的混乱相比，凤阳县几乎所有的水利设施、沟渠、水闸和 泵都处在运转状态。这些东西都是和土地一起承包的么？如果是的话，怎么做的呢？

王副县长向我们确认说，人们仍然是集体拥有这些水利设施。公社和大队根据需要组织水资源分 配，但和过去相比，每个人都必须预先交付现金才能得到水。为了了解这个系统是如何运作的，我们 去了位于该县西边的巨大的凤牙山水库。在那里，低低的起伏的小山忽然让路给了两座巨大的山脉，这提供了完美的水坝地点。该水库水面面积 146 平方公里，存有 125 万立方米的水，其中一半的水可 通过水龙头灌溉。水库目前正为 89000 亩（约 15000 英亩） 的土地提供灌溉，刺激了水稻产量的显著 增长。在颍涧公社，由水库提供水的五分之一耕地的产量已经从 1978 面每英亩 51 蒲式耳增长到 1982 年每英亩 118 蒲式耳。王副县长说农民承包了土地之后产量上涨的原因是：（1） 农民劳动更努力了（2） 他们买了更多的化肥（是 1978 年的 4 倍）（3） 他们种植了大面积的高产量的杂交水稻（4） 他们认真 的灌溉每片土地（预先为每立方米的水付钱使这成为必要）。

在大跃进的年份里通过集体劳动建造的这个水库，仍然是国家单位。该县雇用的职员必须通过销 售鱼和水为日常运转和资本积累提供资金，但在 1979 年以前，这两项产品都没有带来多少收入。当 农民集体需要水的时候，县里的官员没有选择只好放水。获得水的人开始答应说以后给钱，但非常少 的人遵守承诺。每年该县不得不投资 3000-4000 元给水里放些鱼苗，但偷猎者把大部分都偷走了，以 至于官方每年捕获的鱼都没能挣够足够的钱来支付鱼苗。

1979 年所有的情况都改变了。开始，水库职员在付现款的基础上释放灌溉水。下面的小组、大队 和公社不得不提前从农民用户以每 100 立方米 0.5 元的价格收钱。同时他们组织了一个水监护队，每 个小组，每个大队轮流来，保证水到达了每个地点。水库职员，由于手里有了钱，就额外释放了足够 的水以弥补由于蒸发和渗透导致的水流失，并且保持水流直到每个家庭得到了他们为自己的土地所支 付的水。水的收入从 1978 年的 6000 元增长到了 1982 年的 49000 元，水库第一次变的富裕了（有存 款了）

支持产量增长的最重要的客观因素是水利基础设施——大坝，灌溉设施，河沟——是由过去的集 体劳动建造的。农民们在大跃进中建造了大量的这些基础设施，大跃进被“责任制”的支持者们嘲笑 为极左，唯意志论和冒险主义，但如果没有大跃进，凤阳今天能有多少水能够进行分配呢？在大跃进 很久以前，成百万的人也在改造淮河盆地。他们建造了水库以保存流失的水，建造河沟以控制水库不 能保持的水。没有这些集体努力，现在的任何人能够有希望控制充满危险的淮河旁边的低地里的洪水 么？ 其他伟大的工程设施也是必需的，如果凤阳的农民想在未来能够突破到新的粮食产量。这些工作 能够在“责任制”的框架内实行么？能够得到资金付钱给人们让人们为了金钱而单独做他们曾经为了 工分而集体做的事情么？在过去，人们把他们的劳动投资到能够带来未来收益的工程中。他们在数月 甚至数年之后才能收获回报。（如果要做类似的工程）现在农民要求根据天数或者月数提供报酬，那 么必要的资金从哪里来？

支持产量增长的第二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国家的粮食价格体系，该体系慷慨的回报出售给国家多于 要求份额粮食的人。该体系的另一个变种已经长期起作用了。这不是一些最近的报道所暗示的由四人 帮领导发起的。正如该体系今天所做的，高于份额的粮食以高于国家标准 50%的价格出售。由于凤阳 农民过去产出的如此之少，以至于他们的份额一直很低。一旦他们能够提高产量，他们开始收获高于 份额的粮食，并以优惠的价格出售。优惠的价格是收入增长，并让农民能够在生产上投入更多，这反 过来促使产量变得更高。当产量继续增长，以优惠价格出售的粮食不久就超过了以标准价格出售的数 量。额外的收入用来进一步加速上升。今天，凤阳县生产的粮食有多于 80%都高于规定份额的粮食，而且他们以高于标准 50%的价格出售。也就意味着中国全国都在资助凤阳的农业投资和农作物生产。财富在以空前的速度增长，这个速度不能在全国范围内持续。“责任制”通过释放农民的积极性使得 该进程能够进行，一旦该进程开始，通过以高于正常价格出售粮食而带来的额外利润就给当地的经济 增加了全新的（发展） 空间。当资金涌入时，人们把大部分都投资在为粮食生产的增长提供能源和供 给，并且收获了利益，这比单纯扩张的劳动力带来的增加要多得多。把所有的进步都归功于“责任制”，掩盖了高于配额粮食的高价格的影响，它给这些进步提供了巨大的贡献。

在供给缺乏的情况下，有钱也买不到东西。1978 年以来高增长的第三个主要因素便是由于不断提 高的技术水平和物质水平的支持，而这种支持过去是不曾有或仅仅在 60 年代初期有过的。当我问农 民他们这种高增长的具体原因时，他们都说“承包合同给了我们动力”。但是，一个人无论如何努力 工作也不可能使任何一块土地的产量翻两番，当我以此反驳他们时，他们都说“那当然啦，我们购买 了更多的化肥”。事实证明，农民们不仅对每亩地所使用的化肥量是过去的四到五倍，而且他们还首次使用了磷肥 以及氮肥（他们仍然还没使用钾肥）。多种肥料组合的大量使用对产量产生了惊人的效果。当我问及 他们以前为什么没有买更多的肥料时，他们说以前太穷了。但是确切的是，政府过去一直都有贷款给 农民购买肥料。我猜应该是十年前供应不足的缘故吧。即使合作社的农民们在过去能够找到足够的钱，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像现在这样能够买到他们所需要的一切。当我问到他们还有别的什么办法来提高产量时，他们都说“优良的种子”。他们极为称赞某几种 冬麦品种，但是谈得最起劲的便是杂交水稻这一项重大的突破。杂交水稻的推广使得这个国家的粮食 产量几乎翻了一番，而这在五年前是无法实现的。“承包责任制”正是及时抓住了这项新技术并把它 推广，新技术的推广反过来又使得这种承包责任制看起来很有效。难道有谁会说旧的那种农业合作模 式没有使用杂交水稻的优势？我并不这么认为。数年前山西引进杂交水稻的史实便否定了这种说法。在跟农民纠缠于有关获得高产的物质条件这个话题时，他们也时不时地提到了虫害的控制。看来，每 一户人家现在都有一种喷雾器，以使用杀虫剂和杀菌剂来防止水稻、小麦、大豆和烟草的虫害。这样 一来，只要虫害有所呈现，人们便可使用这些药剂在数小时之内把它们消灭掉。而在过去，整个大队 也就仅有一台或两台这样的喷雾器。我问他们“为什么只有这么少呢”，他们答道：“我们太穷了，买 不起更多的工具。”